

适应与选择：中国企业走出去中法律翻译服务的路径研究

——以隆平高科等企业东盟贸易的法律翻译服务为例

张启林 汪世蓉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武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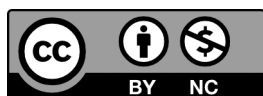
摘 要 | 法律翻译服务是跨文化商务交流中的重要环节，法律翻译路径不清晰、法律翻译人才不足，制约了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需要客观认识到我国法律翻译服务水平有待提升。本文通过东盟成员国泰国种质资源国内法的汉译工作，探讨法律翻译服务应达到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的适应与选择，指出在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国家、社会和企业应从不同层面发挥作用以提升法律翻译服务水平。重视法律翻译服务，企业在进行跨文化商务合作时才能更好地行稳致远，与外国企业互惠共赢。

关键词 | 法律翻译服务；跨文化交流；适应与选择；种质资源保护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一、引言

中国经济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在“十四五”开局之年，克服疫情冲击，交出靓丽答卷。大变局下，中国企业全球化方兴未艾，展现出以亚洲为主，地域多元化的特征（朱天等，2021）。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的成功举办，为中外企业深度参与国际投资与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契机。2021年，中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9366.9亿元人民币，进出口规模首次突破6万亿美元，经济发展的基本面长期向好。我国企业“走出去”正在平稳向前发展，但也面临重重障碍，

主要有硬环境与软环境两个方面。硬环境如交通不便、合作国国内环境动荡、国际环境欠佳等（陈元顺，2019：54-55）；软环境如语言不通沟通不畅、专业人才欠缺、政策支持不足、法律文化冲突、品牌形象不佳等（张文锦，2021：81-84）。经济全球化促进了法律全球化的产生与发展，法律全球化的基本途径是交流、沟通与对话（朱良好，2006：135-139）。语言服务作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软环境，体现着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也是中国企业走向世界、融入世界、影响世界的保障。法律翻译服务作为语言服务的分支，不仅体现着各方法律、语言、文化的差异，也呼应了法律全球化的趋势。

张清（张清，2021：41-48）对中国当代法律语言学做出了综述，提出中国的法律语言发展分为酝酿时期、创立时期、全面发展时期。张法连（张法连，2018：45）强调法律英语是具有战略意义的新型交叉学科，是涉外法律服务中不可或缺的工作语言。杜金榜（杜金榜，2010）将法律翻译纳入法律语言学的范畴，叶洪等（叶洪等，2019：40）进一步提出，我国法学是兼具中国国情与社会改良的翻译法学，“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法律翻译得到普遍重视。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隆平高科）、中国种子集团有限公司（中种集团）等中国农业高新技术企业为了与东盟深化合作，深度参与 RCEP 区域合作平台，推动区域内产业衔接交流，委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对东盟贸易公约进行汇总、研究，从东盟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争端解决以及东盟各国种质资源的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进行翻译与评析，为海南自贸港进出口企业尤其是涉农企业“走出去”提供实务指引和服务，帮助企业规避风险或发生纠纷后合理维权。以该项目中种质资源法律的翻译为例，该项目翻译了泰国 PLANT VARIETIES PROTECTION ACT, B.E. 2542（1999）、缅甸 THE SEED LAW、柬埔寨 LAW ON SEED MANAGEMENT AND PLANT BREEDER'S RIGHTS、马来西亚 PROTECTION OF NEW PLANT VARIETIES REGULATIONS（2008）等种业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笔者参与该项目中种质资源法律的汉译工作。东盟 10 国既属于“一带一路”倡议成员国，又属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成员国，2021 年东盟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但是这些国家的国情、法律体系和法治完善程度有较大差异。东南亚具有优质的农业资源，早在 2003 年，中泰就达成了关于在《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早期收获”方案下加速取消关税的协议，2021 年泰国水果对华出口逆势上涨，中国连续 8 年是泰国最大贸易伙伴。但是中国农业企业对外投资规模较小，增长缓慢，以畜牧业和种植业为主，投资经验不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涉外法律服务发展滞后，涉外法律翻译服务人才短缺，整体水平不能完全适应对外开放的要求。东盟各国由于受到宗教、历史殖民、社会主义思潮等的影响，有议会共和制国家，君主制国家，军政府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等，其法律制度和司法制度也或多或少受到上述

因素的影响，为不同法律语言之间的交流带来了挑战。基于此，本文将以项目之一的泰国 PLANT VARIETIES PROTECTION ACT, B.E. 2542（1999）的汉译为例，探讨法律翻译可以通过哪些路径为我国进出口企业的发展营造专业化的保障机制以及法律翻译服务中的人才培养模式，以期为中国企业尤其是农业企业进行跨文化商务交流时提供帮助，帮助企业避免贸易摩擦。

二、法律翻译中的适应与选择

现代人类居住在各种环境中，面临过多的进化压力，导致对当地环境的多种遗传适应（Rees 等，2020：415）。在翻译服务中，适应与选择同样至关重要。罗森娜·沃伦认为，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就像是把生物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必须适应新的环境才能延续生命（Warren，1989：6）。胡庚申从生物进化论的视角出发，认为在原文—译者—译文三元关系中，适应与选择是生命体（即译者）通过主体意识与主导作用完成的。适应即生命体适应语言、交际、文化等互联互通的翻译生态环境，选择即生命体对译文的优胜劣汰，整合最佳选项（胡庚申，2004：42-69）。法律翻译服务在跨文化商务交流中的路径有其共性可言。在法律翻译服务中，译者不仅要有良好的双语能力，明晰他国法律文化，还要使不同的法律语言之间能够互相交流，努力做到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的适应与选择，以解释为什么一种翻译在特定的翻译生态环境中比另一种翻译获得更好的生存（Yu，2017：49-65）。需要注意的是，翻译是译者主动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活动，在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过程中，并不妨碍其他维度发挥一定的作用。

（一）语言维

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即译者在不同方面、不同层次译出原文的写作风格、修辞手法等语言形式。在法律翻译中，语言维要求译文要准确具体、言简意赅且没有歧义。同时，法律语言的特殊性要求法律翻译遵循重复的原则，从而达到严谨的效果。

例 1：泰国 PLANT VARIETIES PROTECTION ACT, B.E. 2542（1999）对“植物品种”的定义是：“plant variety” means a plant grouping of similar or identical genetic and botanical characteristics, with

particular features which are uniform, stable and distinct from other grouping in the same species of plant.

根据平行文本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NEW VARIETIES OF PLANTS《保护植物新品种国际公约》的规定,申请保护的植物品种应具有以下特点:(i) new, (ii) distinct, (iii) uniform, (iv) stable。《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2015 修订)》第十五条规定:申请审定的品种应当符合特异性、一致性、稳定性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规定,植物新品种具有新颖性、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并对这四种特征作出了明确的解释。仅从语言表达方式来看,“具有……性”也符合中文对事物特征、性质的描述。所以译为:“植物品种”是指具有类似或相同的遗传和植物学特征的植物组群,具有一致性、稳定性和特异性。该译文能够流畅表达出植物品种的特征,也更加正式准确,产生严谨的效果,符合译文法律文本的表达习惯。

例 2: If the rejection of the application for registration of the new plant variety occurs after the publication under Section 22, the rejection order shall be published and Section 22 shall apply *mutatis mutandis*.

译文 1: 根据第 22 条的规定,如果在公布后拒绝植物新品种的注册申请,应公布拒绝令,并比照适用第 22 条。

译文 2: 根据第 22 条的规定,如果在公布后拒绝植物新品种的注册申请,应公布拒绝令,第 22 条应比照适用该拒绝令。

译文 1 与译文 2 对“*mutatis mutandis*”的处理不同,前者是“比照适用第 22 条”,后者是“第 22 条应比照适用”,这两者的意思是完全不同的,前者中的“第 22 条”是作为比照适用的主体,而后者中的“第 22 条”则是作为比照适用的客体。

“*mutatis mutandis*”为法律英语专业术语,来源于拉丁语(用于比较两种或以上的事物或状况)做必要的小更改。在 LexisNexis Law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中译为比照执行(适用)、做出适当的改变后,在引用需要改变从而适应一组新的事实之原则或规则时,此词会被用上。在 Wikipedia English 中, *mutatis mutandis* means “upon changing what needs to be changed,” where what “needs to be changed” is usually implied by a prior statement assumed to be understood by

the reader. 也就是说,在上文的例 2 中,“Section 22”是“what needs to be changed”。同时,在中国法律法规汉英平行语料库中: These Measures shall also, *mutatis mutandis*, apply to overseas use of foreign exchange funds by an insurance asset management company. (资金境外运用 C0165 第三十九条) 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外汇资金境外运用参照本办法执行。

通过专业的法律词典以及上面的例句可以看到,“*mutatis mutandis*”常常与 apply 或 applicable 连用,表示的是前者经必要修改后适用后者。所以译文 2 “第 22 条应比照适用该拒绝令”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在此例中,当第 22 条规定与拒绝令冲突时,后者的法律效力大于前者。同时,译文 2 重复了比照适用的对象,避免引起歧义。

语言学派纽马克(Newmark, 2001: 40)将语言分为六种功能,法律语言则具有信息功能(informative function)。功能主义翻译学派将文本分为:表情型文本、感召型文本、信息型文本(Reiss, 1971/ 2000)。信息型文本强调语言外的事实,传递客观、中立、知识与标准,而不是主观判断。此类文本包括科技文本、法律文本、新闻报道、论文等。法律文本的功能是准确无误地传达具有规定性和约束性的信息,不能有任何遗漏、添加、篡改和歧义,因此法律翻译对语言有更高的要求(高明阳, 2019: 123),译文应具有准确性、严肃性,表达简洁清晰,不能因含糊其辞而造成“失真”现象。

(二)文化维

泰勒将文化定义为“一个复杂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人作为社会成员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Tylor, 1889)。当法律被纳入文化的范畴后,法律语言便具有了文化色彩,法律翻译也不再仅仅局限于字词的对应和法律条款的翻译,而是要考虑到法律文化因素。译者可以使用各种方式弥补他们在特定法律体系中法律术语翻译的不足,但是,如果他们不具备特殊法律术语的文化和背景的知识,即使有保持法律翻译精确和严谨的意识,也可能造成译文的模棱两可或引起歧义(Piszc, Sierocka, 2020: 533-542)。因此,法律翻译中,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要求译者不仅需要注重原语的形式,还需要深谙原语与目标语所属的文化背景。

例 1:《泰国植物品种保护法》的原文本是 PLANT VARIETIES PROTECTION ACT, B.E. 2542 (1999), 翻译为佛历 2542 年(公元 1999 年)《泰国植物品种保护法》。B.E. 即 Buddhist Era。泰国王国 95% 以上的人口信奉佛教, 泰国国王同时也是佛教的最高护法与宗教最高护卫者, 佛教对泰王国的政治、教育、文学艺术以及法律等都产生着深远影响。

例 2: 该法律文本将“locality”定义为: “locality” means a group of people residing and commonly inheriting and passing over culture continually and registered under this Act.

“locality”原意为居民点、群聚地、社区等, 在这里应该译为“土著居民”。泰国王国共有 30 多个民族, 二战以后, 一些东南亚国家虽然短暂采用“土著与非土著”的分类法则, 排斥“非土著”民族, 但是整体而言, 泰国的土著民族与非土著民族关系较为融洽。(曾少聪, 2002: 35-45)。而在我国, “土著”的概念, 是相对于外来殖民者而言。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从中国的历史进程看, 中国的 56 个民族都是中国的世居民族, 因此, 中国不存在像世界一些地区存在的那样的土著人^[1]。因此, 我国通常不会使用“土著居民”来表示本国的一个群体, 而是使用“本地居民”“当地居民”或“少数民族”等。译者在法律翻译中, 要考虑到不同法律语言背后的文化差异, 如果原文是“aboriginal people”或“aborigines”时, 毫无疑问可以译为土著居民; 如果原文是“local people”“natives”或此例中的“locality”时, 则需要进行考究, 以确定该国历史上是否受到外来侵略与殖民、当地民族是否是世居民族, 从而采取不同的表达。了解他国的法律文化是法律翻译的前提, 译者必须深谙他国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的差异。因此, 法律翻译中要注重文化差异, 体现原文的文化内涵, 翻译人员要准确把握法律文化差异, 才能更好地传递法律内涵, 促进中国企业“走出去”。

(三) 交际维

某些概念、制度可能存在于源语言中, 但不存在于目标语言中。同时, 相同的概念在不同国家法律制度中的含义也不尽相同, 从而造成法律翻译过程中难以对等的问题(赵军峰、薛杰, 2022: 27-

33)。国内外学者对此已有所研究, 如穆可娟认为可以采取借鉴法、直译法、意译法、混合法的方式解决不可译或不对等问题(穆可娟, 2015: 111-114)。Rafat 认为, 如果源语中使用的法律术语在目的语中存在完全对等, 那么译者应采取的策略是使用目的语对等, 既不增译也不省略; 如果源语和目的语之间只有部分对等, 可以在适当的地方进行注释; 如果源语和目的语言之间缺乏对等性, 译者可以通过音译法, 铸币法(coinage)、意译法解决不可译或不对等问题(Rafat, 2019: 75-94)。法律翻译不仅要在语言与文化层面适应性选择, 还要通过适应与选择, 达到交际的目的。交际即寻求相同的法律效果, 这是法律翻译的终极目标和最高原则(屈文生, 2020: 8), 使不同的法律语言通过法律翻译可以进行“交流、对话”, 减少法律语言不可译(Untranslatability)的现象。

例 1: 泰国王国 PLANT VARIETIES PROTECTION ACT, B.E. 2542(1999)的第一章第八条第(4)款中, 规定委员会的成员不应“being an incompetent or a quasi-incompetent person”。“incompetent or a quasi-incompetent person”原意为“禁治产人或准禁治产人”。禁治产制度产生于罗马法时代, 泰国王国属于大陆法系(罗马法系), 所以译为“禁治产人或准禁治产人”是合适的。然而, 我国没有禁治产制度, 但是对于“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的规定继受了该制度, 两者在制度目的、规范设计、立法技术的处理等方面相同, 无行为能力人和禁治产人的法律地位相当(李霞, 2008: 81-87)。由于该项目的法律翻译是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服务的, 考虑到译文的读者群体(readership), 笔者在遵循“等效”的原则下, 借鉴我国的法律语言, 将其译为“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

例 2: 东盟成员国越南将种子级别分为 Pre-basic seed、Basic seed、Certified seed、Breeder seed。

[1]《联合国电台记者专访联合国土著人常设论坛中国专家秦晓梅》(<https://www.fmprc.gov.cn/ce/ceun/chn/zgylhg/shhrq/rqsw/t118458.htm>)。土著人和少数民族, 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一些国家, 可能有许多少数民族, 但并不一定有土著人。这种情况在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很多国家非常普遍。

译为前基础种子、基础种子、认证种子、育种者种子。不同国家对种子的分类不尽相同,经合组织(OECD)将种子级别分为前基础种子、基础种子、认证一代种子、认证二代种子;我国将种子级别分为育种者种子、原种、良种;美国分为育种者种子、基础种子、注册种子、合格种子;(张万松等,2011)。可以看到,越南对种子级别的划分方法与经合组织的划分方法基本一致,但是对于“Breeder seed”的划分与中美有较大差异,可见相同的概念在不同的国家也会具有不同的含义或属于不同的级别。为了达到交际的目的,译者需要阐明两者之间的不同,帮助企业进行决策。

表1 不同国家(国际组织)对种子级别的分类

国家(国际组织)	越南	经合组织	中国	美国
级别	Pre-basic seed	前基础种子	育种者种子	育种者种子
	Basic seed	基础种子	原种	基础种子
	Certified seed	认证一代种子	良种	登记种子
	Breeder seed	认证二代种子		认证种子

此外,法律概念或法律效力的内涵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化。为了使不同的法律语言通过法律翻译进行“交流、对话”,译者还需要关注最新的法律动态、各种听证会与草案等,了解跟进最新法律资讯。如泰国公共卫生部于近期签署了《大麻法案草案》,支持大麻合法化,准备采取措施促进大麻的开发和利用。泰国农业部于2018年针对植物新品种的保护拟出一项新的法律草案,该草案旨在修改植物新品种保护法案B.E.2542(1999),使泰王国的法律遵从1991年3月19日国际会议颁布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UPOV1991)。在该草案中,植物育种家的权力、植物新品种保护期都有所变化,同时提出了“依赖性派生品种”(EDV)以及“收获材料”的概念(2018:48)。译者需要遵循发展原则,以前瞻性的思维关注法律规定的演变,在法律翻译服务中才能更加得心应手。

三、加快法律翻译服务人才的培养,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

目前精通国际法律知识以及具有良好双语能力的法律顾问资源不足,制约了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加快法律翻译服务人才的培养与供给刻不

容缓。

第一,从国家层面,通过智库对不同国家法律文化进行汇总分析,如一带一路国家、东盟各国等与中国经济来往密切的国家,形成具有逻辑性的条目,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实务指引。2018年,国家发改委就联合了外交部、商务部、人民银行等印发了《企业境外经营合规管理指引》,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指导和支持;鼓励专业人才构建法律服务和咨询体系,成立顾问公司、智库、等市场中介组织,帮助企业进行决策(张浩辰,2020:9-10)。为了切实履行世贸组织有关透明度的义务,我国建立了TBT(《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和SPS(《实施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的协议》)国家咨询制度,统一代表中国政府机构、行业企业和个人向WTO其他成员进行咨询活动,为构建法律翻译人才信息管理系统,提高法律翻译服务的专业性提供了思路和启发。

第二,从社会层面,高校、科研院所等应加强法律翻译人才的培养,将外语与法律有机结合,支持新文科建设,鼓励高校开设跨学科跨专业新兴交叉课程、实践教学课程,选派优秀学生进行校内校际联合培养或国内外共同培养,培养学生的跨领域知识融通能力和实践能力,打造高效的国际化流动人才,服务于国家利益与国家战略需求。2021年我国新增了第14个学科门类“交叉学科”,我国单一学科制的教学科研模式慢慢向交叉学科制变化,法律英语也从理论转向实践(张法连,2021:14)。以笔者所在学校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为例,该校为本科生开设了“卓越法律人才实验班”,努力培养一批熟悉我国主要法律、法规和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相关法律,同时掌握双语技能、具备国际视野和涉外能力的应用型、复合型高精尖法律人才;为外国语学院研究生开设了法商笔译课程,努力培养具备法律与经济理论基本知识的高素质翻译人才,提高学生的“社会适应性”。2021年8月,教育部发布了中外合作办学自主招生院校清单,该校“欧洲学:比较法与欧洲法”硕士学位教育项目在列,该项目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与意大利罗马第一大学合作创办,致力于培养理论素养与实践技能兼具的复合型涉外高端法律人才。

第三,从企业层面,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要注重培养专业法律翻译服务人才或设立专业涉外

部门，结合公司实际需求，研修国际公约与当地法律法规。目前仍有许多国家法律体系不健全、不完善，或因政局动荡而不稳定，尤其是在项目国或合作国没有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的情况下，企业更要谨慎行事，认真了解国际条约或国际惯例以及项目国或合作国的约定俗成、惯例判例。无论是直接投资还是开设子公司，都要遵守他国相关法律法规，严格依法合规经营，不能抱有侥幸心理。

四、结语

准确严谨的法律翻译有助于弥合不同国家法律法规的差异，是企业“走出去”的金钥匙。当前在跨文化商务交流中，我国企业仍然面临着语言沟通不畅的挑战，法律语言服务对于企业发展的潜力仍有待挖掘，客观认识到法律翻译的重要性对本国的经济发展以及国家间的沟通交流与务实合作至关重要。中国企业深度参与国际合作，需要重视法律翻译，同时也需要译者在法律翻译服务中做到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的适应与选择。国家、社会和企业自身也应为法律翻译服务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帮助企业进行跨文化商务合作时与他国企业互惠共赢。

参考文献

- [1] Peter Newmark. 翻译问题探讨 [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 [2] Piszcz A, H Sierocka. The Role of Culture in Legal Languages, Legal Interpretation and Legal Translation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the Semiotics of Law—Revue internationale de Sémiotique juridique*, 2020, 33 (2).
- [3] Tylor E B. On a method of investig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institutions: applied to laws of marriage and descent [J]. *The Journal of the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889 (18): 245-272.
- [4] Rafat Y, Alwazna. Translation and Legal Terminology: Techniques for Coping with the Untranslatability of Legal Terms between Arabic and English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the Semiotics of Law*, 2019, 32 (1): 75-94.
- [5] Rees J S, Castellano S, AM Andrés. The Genomics of Human Local Adaptation [J]. *Trends in Genetics*, 2020: 415.
- [6] Reiss K. Translation Criticism: Potential and Limitations (Translated by E. Rhodes) [M]. Manchester: ST Jerome, 2000.
- [7] Warren R. The Art of Translation: Voices from the Field [M].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89: 6.
- [8] Yu Z. Translation as adaptation and selection: a feminist case [J]. *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ology*, 2017: 49-65.
- [9] 陈元顺.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环境挑战 [J]. *发展研究*, 2019 (11): 54-55.
- [10] 杜金榜. 法律语言研究新进展 [M]. 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0.
- [11] 高明阳. 浅谈法律英语的语言特征和翻译 [J]. *海外英语*, 2019 (17): 123.
- [12] 胡庚申. 翻译适应选择论 [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 [13] 李霞. 论禁治产人与无行为能力人的当代私法命运 [J].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2008 (5): 81-87.
- [14] 穆可娟. 法律英语汉译中的术语不可译及其处置 [J]. *外语学刊*, 2015 (3): 111-114.
- [15] 屈文生. “一带一路”国家立法文本的翻译：国家需求、文本选择与等效原则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20 (6): 8.
- [16] 泰国颁布新法律草案保护植物新品种 [J]. *农化市场十日讯*, 2018 (6): 48.
- [17] 叶洪, 段敏. 中外法律语言学研究：十年回顾与展望 [J]. *外语与翻译*, 2019 (2): 38-45+98.
- [18] 曾少聪. 东南亚华人与土著民族的族群关系研究：以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为例 [J]. *世界民族*, 2002 (2): 35-45.
- [19] 赵军峰, 薛杰. 法律翻译的概念移植与对等阐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权编术语英译探究 [J]. *上海翻译*, 2022 (1): 27-33.
- [20] 张法连. 新时代法律英语复合型人才培养机制探究 [J]. *外语教学*, 2018 (3): 45.

- [21] 张法连. 涉外法治专业人才培养需要厘清的几个问题[J]. 新文科教育研究, 2021(4): 14.
- [22] 张浩辰.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国际化经营和跨境流动人才管理的挑战[J]. 首席人才官商业与管理评论, 2020(1): 9-10.
- [23] 张清. 我国当代法律语言学研究综述[J].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 2021, 28(3): 41-48.
- [24] 张万松, 王春平, 张爱民, 等. 国内外农作物种子质量标准体系比较[J]. 中国农业科学, 2011.
- [25] 张文锦.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跨文化问题思考[J]. 国际工程与劳务, 2021(12): 81-84.
- [26] 朱良好. 法律全球化与对话[J]. 北方论丛, 2006(6): 135-139.
- [27] 朱天, 张华, 李铭俊, 等. 2021中欧EMBA学员企业全球化调研报告[R/OL]. 中国国际工商学院. (2022-03-26). https://mp.weixin.qq.com/s/1_WzW_TbOmmn-0417U05PQ.

Adaptation and Selection: On the Path of Legal Translation Services in Chinese Enterprises' Going Global —Take Legal Translation Services for the Trading Between Yuan Longping High-Tech Agriculture Co., Ltd. and ASEAN for Example

Zhang Qilin Wang Shiro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Abstract: Legal translation services are important in cross-cultural business communication. The unclear path of legal translation and insufficient legal translation talent have restricted enterprises' "going out" strategy. It is necessary to recognize that legal translation services in China needs to be improved.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adaptation and selection of legal translation services in the linguistic, cultural and communicative dimensions through E-C translation of the law on the protection of generic resources of Thai, and points out the way to improve legal translation services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of the nation, the society and enterprises. Enterprises can better benefit from cross-cultural business cooperation and win together with other countries through such services.

Key words: Legal translation services;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daptation and choice; Genetic resources protection